

北京图书馆宋版书叙录(二)

李致忠

三、《春秋繁露》十七卷 汉董仲舒撰 南宋嘉定四年(1211)胡槻江右计台刻本。

董仲舒，生于西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享年七十五岁。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西汉著名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乃为汉武帝所采纳，后来便随之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

董仲舒本来专治《春秋公羊传》，后借助春秋公羊学，杂凑阴阳五行说，撰著《春秋繁露》。他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熔三纲、五常、三统、三强、性三品等为一炉，形成为封建的神学体系。而这个体系的中心，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对地上的统治者经常用符瑞、灾异分别表示希望和谴责，用以指导他们的行动。将天道和人事牵强比附，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为君权神授制造理论。所以《春秋繁露》虽然颇本《春秋》以立论，反复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但内容多与《春秋》经义无涉，实似《尚书大传》、《诗外传》一类的著作，已非解经之正道。特别是弥漫书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实开后来讖纬之先河。所以它

已非经学之作，更非《春秋》经解。但若研究董仲舒的思想，却又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春秋繁露》历来传本极多，但全且善者绝少。宋代楼钥于嘉定三年（1210）写的一篇跋文，颇能反映这种情况：

《繁露》一书，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议先生序文。始得写本于里中，亟传而读之，舛误至多，恨无它本可校；已而得京师印本，以为必佳，而相去殊不远。又窃疑《竹林》、《玉杯》等名，与其书不相关。后见尚书程公跋语，亦以篇名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所引《繁露》之书，今书皆无之，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自为一编，记杂事，名《演繁露》，行于世。开禧□□，今编修胡君仲方掾宰萍乡，得罗氏兰堂□刻之县庠，考证颇备。凡程公所引三书之言，皆在书中，则知程公所见者未广，遂谓小说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终不合《崇文总目》及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数。余老矣，犹欲得善本。闻婺女潘同年叔度景宪多收异书，属其子弟访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乡本犹未尽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长，悉加考定。义通者两存之；转写相讹，又古语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会解》一书□年所集，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条，今皆具在。……前后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阙焉。惟《玉杯》、《竹林》之名未有以订之，更俟来哲。仲方得此，尤以为前所未见，相与校讎，将寄江右漕台长兄秘阁公刻之，而谓余记其后。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楼钥书于攻媿斋。”

楼钥字大防，号攻媿主人，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市）人。隆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繁露》一书，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议先生序文。”说的是他所得到的四种《春秋繁露》传本，都带有他祖上写的序文。实际指的是他的五世祖楼郁于庆历七年

(1047) 给《春秋繁露》所写的序文。楼郁字子文，本籍奉化，后徙居于鄞。登皇祐进士，官至大理评事。庆历中为郡县教授，学者称西湖先生。他给《繁露》作序，盖在他做郡县教授之时。这是现知《繁露》一书最早的刻本。到一百六十三年后的嘉定三年，楼郁的五世孙楼钥，又收集各种传本，却又都舛误至多。且疑其中《玉杯》、《竹林》与董氏《繁露》无干。“后见尚书程公跋语，亦以篇名为疑。”指的是程大昌给《繁露》写的跋语。程大昌字泰之，休宁（今属安徽）人。绍兴进士。孝宗时累官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他既给秘阁所藏《繁露》写跋，表明此书在南宋初期亦尝可能寿之梨枣。然程氏过于武断，以《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所引用的《繁露》文字，当时传本中无之，并类小说家言，遂以为非董氏本书，反“自为一编，记杂事，名《演繁露》行于世。”故南宋初期所传之《繁露》，亦非足本。开禧三年（1207），编修胡榘来宰萍乡，得罗氏兰堂传本，主持刻印于萍乡县学。虽包含了程大昌所引上述三书有关《繁露》的文字，但亦止有三十七篇，“终不合《崇文总目》及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数。”所以仍然是个不全之本。这才促使已届暮年的楼钥矢志寻求善本。果然，后在潘景宪处“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乡本犹未为其半也。”潘景宪字叔度，隆兴间与楼钥登同榜进士，故称“潘同年叔度景宪”。楼钥得此善本“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长，悉加考定。……仲方得此，犹以为前所未见。”于是“相与校讎，将寄江右漕台长兄秘阁公刻之。”仲方就是胡榘，由于他在开禧三年于萍乡县学刻过《繁露》，但仅有三十七篇，不及其半。故见此全本，便相与讎校，并准备将书稿寄至江右漕台长兄处刊板印行。

翌年四月，当《繁露》镌版竣工之际，胡榘也写了一篇识语镌附书后，以记其镌刊始末。“榘顷岁刻《春秋繁露》于萍乡，凡十卷三十七篇，虽非全书，然亦人间之所未见，故乐与吾党共

之。后五年官中都，复从攻媿先生大参楼公得善本，凡八十二篇，为十七卷，视《隋·唐志》、《崇文总目》所□篇卷皆同，唯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雠校，是正讹舛，今遂为全书。乃录本属秘阁兄重刊于江右之计台，以惠后学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宗正丞兼权右司郎官兼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胡榘书。”这是现知《春秋繁露》第一个最全的刻本。这当中，楼钥与胡榘的功劳，由于有这两道跋文，后人不会忘怀。但是实际主持梓行之事的胡榘之兄，却鲜为人知，功德未显。

考胡榘，是胡泳或胡澥之子，胡铨之孙。胡泳，字季永，胡铨之子。年六岁，随铨调新州。诗人陈元忠目为春秋生。及归庐陵，讲道家塾，学有家法。官至承务郎。淳熙初年卒。依此行实推测，胡泳似是胡铨长子。胡澥，因父荫曾官江东运判。可能是胡铨的次子。胡榘字仲方，是胡铨的次孙，尝为江西宪。“杨长孺称之曰：‘绣衣王斧，武惠兼施，玉虹翠浪，又逢贤主。’盖用苏轼虔州诗以美之也。宁宗朝仕工部尚书。”（〔乾隆〕《庐陵县志》卷二十七）该县志卷二十四荫任类，又说胡榘因祖父胡铨之荫，官至兵部尚书，晋少保。而《宋史·胡铨传》记载铨“孙槐、榘，皆至尚书。”可知榘兄是胡槐。而据〔乾隆〕《庐陵县志》卷二十四荫任类记载，“胡槐，铨孙，荫官至户部尚书。”这弟兄俩究竟出于胡泳与胡澥那一门，便无从查考了。胡槐似乎没有弟弟胡榘社会活动强和社会声誉高。然而胡榘亦被〔乾隆〕

《庐陵县志》卷二十七说成“无事实可录，《通志》采《豫章诗话》立传，今录之。”那么比胡榘更“无事实可录”的胡槐，就更加无以稽考了。这一点至少是从清大内天禄琳琅以降，直至198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都没能考出其入其事。现在虽然也未能考出胡槐的详细行实，但毕竟找到了他的某些人生痕迹。这样，嘉定四年胡榘于《春秋繁露》跋文中所说“乃录本属秘阁兄重刊于江右之计台”语，总算可以做出进一步

的交待了。即胡榘所属的“秘阁兄”，总算可以推知便是胡槻了。现在既然考出“秘阁兄”是谁，那么镌刊《春秋繁露》的主持人也就是胡槻。

跋语中所称“江右”，魏喜的《目录杂说》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可知跋语中的江右，实际指的就是今天的江西省。

前引嘉定三年楼钥为《春秋繁露》写的跋语中，有“仲方得此，尤以为前所未见，相与校讎，将寄江右漕台长兄秘阁公刻之”之语。嘉定四年胡榘为《春秋繁露》写的跋语中，又有“乃录本属秘阁兄刊于江右计台”之语。这里的“江右漕台”与“江右计台”似是名异而实同。按《历代职官表》提举常平司条，称“南宋时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与提举常平，称为帅、漕、宪、仓四司。宋初转运使又号称漕司。因有兵权，又号称漕帅。由此可以推知，上述跋文中所说的“漕台”，实为转运使司之别称，或者说是漕司的别称。又由于转运使司掌管一路或数路军需粮饷、财赋，实关民生邦计，故又有计台之称。此书既题刻于江右计台，实则就是江西转运使司刻本。这种单位握有一定地方范围的军政与经济实权，可谓既有权，又有钱，所以刻起书来就铺陈考究。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本《繁露》，原著录为“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现在既有了前边的考证，其版刻似可进一步著录为“嘉定四年胡槻江右计台刻本”了。此本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字体端庄，刀法严整。皮纸印造，墨色精纯，开本宏朗，不失官本规制。书中“讓”字有缺末笔避讳的，亦有不避的。遇桓、慎等字皆缺末笔以避讳，此亦为宋版书的常见现象。版心上镌字数，下镌刊工姓名：计有胡俊、邓安、翁遂、王相、王礼、宁、黄鼎、郁等，似都是当地刻工。

此书卷首钤有“皇甫子孙”白文印记，“华阳山人皇甫冲印”朱文印记，“秋火何处堪消写，元晏先生满架书”朱文印

记，“宋本”朱文印记，“乾学”白文印记，“徐健庵”朱文印记，“季印振宜”朱文印记，“沧苇”朱文印记。卷首、二、六、八、十一、十五，钤有“经术堂”朱文印记。卷一、二、八、十一钤有“季振宜藏书”朱文印记。卷二、五、七、十、十四、末钤有“华亭朱氏”白文印记等。这些印记能大体反映出此本的递藏关系。

“皇甫子孙”、“华阳山人皇甫冲印”等，是皇甫冲的藏书印记。皇甫冲字子俊，长洲人，明嘉靖七年（1528）举人。与其弟潯、沆、濂，号称四皇甫。家富藏书，此本《春秋繁露》即是当年他的旧藏。

“华亭朱氏”乃朱大韶藏书印记。朱大韶字象玄，松江华亭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庶吉士。“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版。尝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槧袁宏《后汉纪》，系陆放翁、刘须溪、谢叠山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盖非此不得也。”（《中国藏书家考略》）足见其对宋版书是十分珍视的。此书有他的印记，证明此本《繁露》又曾经朱大韶收藏。

季振宜字诒兮，号沧苇，清代扬州泰兴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兰谿令，历官刑、户两曹。擢为御史。家财万贯，性嗜收藏，江南故家之书多归之，精本最富。此书既有“季印振宜”、“季振宜藏书”等印记，证明此本《春秋繁露》到清初又曾是季振宜的架上之物。

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清初江苏崑山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刑部尚书。于所居之处建楼，专供藏书。并以此为珍贵之物传给子嗣，故名“传是楼”。此书既有“乾学”、“徐健庵”等印记，表明此本《春秋繁露》从季振宜处又传给了徐乾学。

大概是从传是楼散出后，此书则进入大内，成了天禄琳琅继收之物。以书中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

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继鉴”等印记可证。此书在天禄琳琅时还是完美无缺，但当天禄琳琅藏书散出后，此本辗转归入北京图书馆时，已残去一、二两卷。所以北京图书馆于1959年编制出版藏善本书目时，该书只得著录为存十五卷，卷三至十七。1975年春天，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忽接天津周叔弢先生托人捎来的一封信。信中谈及他在天津古旧书店见到一册《春秋繁露》，似为宋刻。并嘱该书店负责人留住此书。北京图书馆当即派人前往津门，结果以二百元人民币将此册买回北京。与原藏此书一对，非但是相同版本，而且本来就是天禄琳琅原藏那一部的第一册，封面书签，都还是宫中旧物，且亦钤有天禄琳琅的那几颗大印。于是一部分散多年的珍本秘籍又破镜重圆了。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书林佳话。

此本《繁露》在明初曾收入《永乐大典》，之后便隐而不显了。到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虽一再下令广征天下遗书，但终未见到此本《繁露》的复出。馆臣们无奈，只得从《永乐大典》中再将其辑出，收入《四库全书》。现选录一段《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于《春秋繁露》的提要，便能映衬出宋刻此书的版本价值了：“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余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籍。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沉于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这段提要既道出了《大典》本《繁露》之优长，也反映出清政府稽古右文、广征天下遗书的局限。然而，今天这个嘉定原

本的复出，才真正是幽光再现，珍秘重明了。

关于嘉定江右本《春秋繁露》的优胜处，可借用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的褒贬加以说明。“《春秋繁露》十七卷，明刊黑口本，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四周双阑。前有庆历七年四明楼郁序，后有嘉定三年楼钥跋，又嘉定辛未胡榘跋。盖榘从攻媿得善本，属其兄重刊于江右漕台者也。明本虽出于江右本，而讹脱百出。黄尧圃假得秦敦夫所藏虞山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校勘一过，凡夺文讹字咸依以雠正。盖《大典》本未出以前，此为最胜矣。……昨岁从上海涵芬楼假得明影宋写本，因属赵君万里代为校勘于《汉魏丛书》本上。据赵君云，其佳胜与《大典》本相同。半叶九行，行十八字，与述古堂影宋钞本行款相同。今以此本参之，凡订讹补脱之处，视涵芬楼本多吻合。惟与《大典》本则偶有出入。岂如尧圃所言，或《大典》纂辑时稍加点窜耶！”这段题记说的是明影宋写本与《大典》本相校，已见出《大典》本的劣势。而这种劣势，前人已推测《大典》在纂辑过程中对所据底本可能有随意点窜之处。这亦间接反映出嘉定江右原刊本《春秋繁露》是最优胜之本。依次排比下去，其次者是明影宋写本，再次者是述古堂影宋钞本，再次者才是《大典》本，也就是今天传世的《四库全书》本。他如明刊诸本，视上述诸本，则都要下算一等了。

四、《春秋传》三十卷 宋胡安国撰 南宋初刻本。

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生于北宋熙宁七年（1074），卒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享年六十五岁。谥“文定”。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初入太学，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及颖川靳裁之为师。裁之尝与之论经史大义，深奇重之。待廷试，考官尝定其策为第一。奈宰职以其策文缺少批判元祐党人语，遂以何昌言为第一，方天若次之，哲宗亲擢胡为第三。初

提举湖南学事。政和元年（1111）又提举成都学事。二年，丁内艰。待父没丧终，亦称疾不仕。靖康元年（1126），除太常少卿，辞；除起居郎，又辞。绍兴元年（1131），除中书舍人兼侍讲。安国精研《春秋》，故又除安国为侍读，专讲《春秋》。绍兴五年（1135），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安国均辞。故诏以经筵旧臣，重闵劳之，特以其请，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又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又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自王安石废《春秋》不列于学官，至胡安国始起而辨之。谓“‘先圣手所笔削之书，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知习，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始乎此。’故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并被他视为“传心要典”（《宋史·胡安国传》）。足见其潜心《春秋》之学，经数十年，累数百月矣。故其所撰《春秋传》，可谓兴废经，继绝学之划时代作品。成为后世几百年举子读本。

《四库全书总目》之《春秋传》提要云：“案《玉海》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徽猷阁待制胡安国经筵旧臣，令以所著《春秋传》纂述成书进入。十年三月书成，上之。诏奖谕，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币。是安国此《传》久已属稿，自奉敕撰进，又覆订五年而后成也。俞文豹《吹剑录》，称其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四库馆臣多是当时的饱学之士，但因其时未见到《春秋传》的宋刻本，只以通行本为底本，故其成书问题也要曲折考证，最后还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宋史·胡安国传》称其奉旨纂修《春秋传》是在绍兴五年。这一点已如上述，与《玉海》所载无异。书成奏进，《宋史》未明记年月。因此，四库馆臣便相信《玉海》所记，说是“十年三月书成，上之。诏奖谕，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币。是安国此《传》久已属稿，自奉敕撰进，又覆订五年而后成也。”

这就未免又失于考证而妄下结论了。考胡安国谢世，是在绍兴八年。岂有八年已死反到十年三月才把书写完并上表进呈的道理呢！实则是四库馆臣没有目睹胡安国的进书表，现从宋本《春秋传》卷前将表文择要抄出，其真相便会不论自白。《表》称：

“臣安国言，臣昨奉圣旨纂修所著《春秋传》，候书成进入。续奉圣旨，令疾速投进。今已成书，谨写奏御。……陛下天赐勇智，圣德日新……发于独断，崇信是经，将以拨乱世反之正。圣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诵习其书者，使训明其义。而臣以荒芜末学，荣奉诏音，辄不自揆，罄竭所闻，修成《春秋传》三十卷，十万余言，上之御府……。绍兴六年十二月 日左朝散郎充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赐紫金鱼袋臣胡安国上表。”

《表》中所称“昨奉圣旨纂修所著《春秋传》”，相对于绍兴六年书成表进，恰是绍兴五年始奉旨纂修。这一点与《宋史·胡安国传》及《玉海》记载均相吻合。“昨”即指“昨年”、“去年”。“继奉圣旨，令疾速投进。”盖指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二十七日胡安国《论名讳劄子》奏进后，“三省同奉圣旨依奏，仍疾速投进。”（宋本《春秋传》前附《论名讳劄子》）由于圣上一再催促，故于十二月便疾速表进了。书进之后，深得南宋高宗赵构的赏识，诏“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未行，遭谏官陈公辅、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交章论安国学术颇僻。”故又“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这些事大约都发生在绍兴七年（1137），翌年，胡安国便与世长辞了。四库馆臣将《春秋传》成书表进的时间推至绍兴十年（1140）三月，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认为胡氏“此《传》久已属稿，自奉敕撰进，又覆订五年而后成也。”的推说，那就更近乎无稽之谈了。

胡氏《春秋传》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兴废继绝的作用，故自问世以来光在南宋大概就有几种刻本。据袁寒云跋称，除了本

文所要介绍的这个本子外，还曾有过巾箱本、大字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胡氏《春秋传》三十卷《通例》一卷《通旨》一卷，并说“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以其徒问答及其它议论条例，凡二百余章，其子宁辑为一书。”这显然是南宋较后刻的本子。因为胡氏当时进书之原稿，绝无这类附加的内容。待他儿子摭拾胡氏与徒众问答讨论有关《春秋》的议论，编成《通旨》，附于《春秋传》之后，这显然是较晚以后的事了。因此，《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本子，恐怕既不是袁寒云跋文中说的巾箱本、大字本，更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这个版本。本文所要讨论的这个本子，被袁寒云称为“胡氏原刊”。语义虽然含混，其意盖指此本是胡氏《春秋传》的原刊本，或者说是《春秋传》的最早刻本。他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可信，但此本镌印较早则是有根据的。

此本为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字近欧体，秀雅端庄，皮纸印造，墨色精良，举目便知其为宋刻中的上乘。此本，北京图书馆现藏两部。一部原是瞿氏铁琴铜剑楼的旧物，另一部是原潘氏宝礼堂的旧藏。铁琴铜剑楼一部，卷前有胡安国自序及绍兴六年十二月进书表，论名讳札子，又有《述纲领》、《明类例》、《谨始例》、《叙传授》，凡七篇。宝礼堂那一部仅存《谨始例》之半及《叙传授》一篇，其余均佚。其版式：各卷首行题春秋传卷第几，次行低四字题某公上下。首卷第二、三行题左朝散郎充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赐紫金鱼袋臣胡安国奉圣旨纂修，余卷不载。书口题胡春秋卷几、胡春秋几，春秋传几，春秋卷几、春秋几及叶码，下记字数及刻工姓名。刻工有马正、宋圭、宋林等，余为升、琳、元、圭、林、宋各单字。

此本究竟刻于何时何地，没有详细记载可证。书中凡遇玄、弦、殷、弘、泓、匡、胤、恒、禎、贞、懲、徵、讓、桓、慎等字，皆缺末笔，以示避讳。而遇惇、敦、憖等字则均不缺笔，表

明这几个字不行回避。玄、弦、殷、弘、泓等字缺笔，避的是赵宋祖及远祖嫌名讳。匡、胤、恒、禎、贞、懲、徵、讓、桓等字缺笔，避的是北宋已故诸皇帝的嫌名讳。慎字缺笔很重要，表明南宋第二帝皇帝赵昚的嫌名已行回避。而惇、敦、熟等字不缺笔，说明南宋第三帝皇帝赵惇的嫌名不行回避。这种避讳现象表明，此书之刻早不会早到高宗，晚不会晚到光宗，实则必在孝宗赵昚之世。孝宗赵昚行用过隆兴、乾道、淳熙三个年号，在位凡二十七年。避讳既至慎字止，便可充分说明此书之刻就在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十六年（1189）这二十七年之间。此时尚属南宋前期，故此书可著录为南宋初期刻本。至于刻于何地，更无确凿证据可资考定。观其版刻风貌、印纸墨色、字体刀法，似是浙江刻本，但亦不敢武断结论。此书自绍兴六年进呈，到孝宗时才雕板行世，中间隔了几十年。盖书稿表进之后，荣登册府，弃于秘阁，一时未登梨枣，几十年后才镌板梓行。这在敕撰之书中是常见的现象。故袁寒云跋称此本为“胡氏原刊”，意即此书的最早刻本，亦未始不可聊备一说。

前边在介绍张洽《春秋集注》德祐元年（1275）卫宗武刻本时，曾谈及书前附有张洽申明名讳的小贴子，贴称：“洽照得绍兴间侍读给事胡公被旨纂修所著《春秋传》，书内本文及已见援引它书应有犯渊圣御名及本朝庙讳，并不改易本字，但缺点画，为字不成，覆以黄纸。今来洽所缴申三件书内，有与前项事理一同，虽昨来不曾申明，辄敢冒昧遵用绍兴已降指挥体例，并依本字修写，覆以黄纸，以彰圣朝尊经术，开不讳之圣德。”这篇小贴子中所说的凡遇“渊圣御名及本朝庙讳，并不改易本字，但缺点画，为字不成，覆以黄纸。”及“遵用绍兴已降指挥体例”，都指的是胡安国于绍兴六年表进《春秋传》前夕，事先奏进的《论名讳札子》。这道札子至今仍附于本文所介绍的宋本《春秋传》卷前，现择要抄出，以状其体例首创之功。

臣昨列职经筵，专以《春秋》进读。缘《春秋》正文有渊圣御名，方具奏札，未及进禀，得罪去国。后闻礼官建议以它字易之，定读为威，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旨纂修，于经传本字既有诏令可遵，即未委臣所纂修出于己见援引它经子史有犯渊圣御名者，亦许依本字书写，或当迂避，有此疑惑。臣闻古者不以名为讳。……周人以谥易名，于是有讳礼。……自汉已来此义不行，臣子习为谄谀，而不知恭顺之实。则有易人之名，以彻为通者；易人之姓，以庄为严者……。又其甚，则有父名晋肃而子不敢应进士举者。忌讳既繁，名实愈乱。本朝恭袭汉唐故事，未暇尽革。恭惟陛下天纵聪明，既尊《春秋》之书，以新圣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断政事。凡所施設，动以《春秋》从事，既有拨乱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缮写进本，援引它经子史之类，欲乞应犯圣朝庙讳不可迂避者，依太常博士王皙所进《春秋解》例，并依监本，空缺点画。于渊圣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黄纸，庶几名实不乱。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谄谀之端，向孟轲氏钦王之义，恭明顺之，实取进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奏，仍疾速投进。”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经传本字有犯渊圣御名者并不改易，这已有令可循；二是出于己见而引证其它经子史文字中有犯渊圣御名者，是依本字书写，还是应当迂避呢？尚疑惑不解。因此，上《论名讳札子》，申明自己的意见，以禀圣裁。他的意见也有两层意思：一是援引它经子史之类，凡遇文字有犯圣朝庙讳而又不可迂避者，则依太常博士王皙所进《春秋解》例，并依监本，空缺点画；二是遇到渊圣御名，即当今圣上嫌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黄纸，庶几名实不乱。他认为这样做是上遵《春秋》之法，下亦消臣子谄谀之端。札进之后，于绍兴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奏，也就是获得了批准。也就是前述张浚进

《春秋集注》时所遵用的程式和体例。

北京图书馆所藏两部南宋初期刻本《春秋传》，一部来自潘氏宝礼堂，一部来自瞿氏铁琴铜剑楼。宝礼堂一部书前有袁寒云亲笔跋文。称：“此胡氏原刊。……或疑此为元刊，以其双栏也，不知宋刊亦有双栏者。而元刊此书无‘左朝散郎充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赐紫金鱼袋臣胡安国奉圣旨纂修’二行，近见元刊残本可以证矣。乙卯二月初七日寒云记于来福堂。”这段跋文没有多大参考价值，但亦由此可知此书宋、元刊本区别之处。

铁琴铜剑楼一部，有“华亭朱氏”、“顾氏从义”、“顾”、“从德”及“宗伯”、“袞谿”、“袞谿后乐园得闲堂”等印记。说明此书自明朝即流传有绪。“华亭朱氏”是朱大韶的藏书印。朱大韶字象玄，明松江华亭人。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性好藏书，尤爱宋时镂板。尝访得吴门故家有宋槧袁宏《后汉纪》，遂以一美婢易之。足见其嗜宋如命。此书经他收藏，亦可证明其身分所在。顾从义字汝和，号砚山，明上海人。嘉靖中诏选端行善书，从义名第五，授中书舍人。隆庆初以修国史擢为大理评事。笃志摹古，精于赏鉴。好文爱士，吴越间推为风雅薮。嗜藏古印、碑贴。此书亦其插架之物。顾从德字汝修，亦为明时上海人，亦好收藏钁印。书中有他们的印记，与朱大韶又同属松江人，故有继藏关系。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春秋繁露序

樓

郁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于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于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